

## ■新作聚焦

## 邱华栋“社区人系列”小说

## 生活的绝对侧面

□陈晓明

“社区人系列”是邱华栋的一本由系列短篇构成的长篇小说，分为《来自生活的威胁》《可供消费的人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系列中，他描写了发生在北京的一个郊区中产阶层人士居住的社区人的系列故事。在结构上，章节与篇什之间互相有一些联系，也许可以叫做糖葫芦小说或者橘瓣式小说，是由系列小说构成的一个整体。这样的小说，过去有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还有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和巴别的《骑兵军》。这样的系列小说在结构上看似相对松散，但是却表达了一个意念，书写了一个群体，或者描绘了一个地域的人文图景。

在这两册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北京郊区的新型社区里，邱华栋十分敏感地发现了这些中产阶级人群的家庭问题和“情感痛点”，以及他们的不如意。故事是有趣的、紧张的甚至是离奇的；有要打铁的当代城市白领；有几年之内就把所有的钱折腾光的富翁；有单亲母亲面对自己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女儿的慌乱；有音乐家和他那懂音乐的狗的故事；有网络爱情的悲惨结局；有令人羡慕的成功夫妻之间生活的阴暗面；有心理学家逼

疯了自己的舞蹈演员妻子；有飞行员和蛙人的完满爱情；有艺术家和他的马的生死离别；有弱智儿童的纯洁短暂的生命；还有社区童军的一次暴露复杂人性的野外行军，有因为寻找代孕人导致家庭分崩离析的夫妻，等等。邱华栋用他相当精到的叙事手段，用60个片段短章，描绘了当下中国城市人口分出阶层之后，内心和外部生活的复杂性，其中夹杂着对人性的探索和作者强烈的悲悯之心。这两册书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契佛、约翰·厄普代克、雷蒙德·卡佛等人性精巧的文学技巧和叙事风格，又与中国最具生长性的社会人群的内心观察相结合，极具欣赏性和阅读性。

就当代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王朔生长于北京，他天然就是一个城市公民，邱华栋则从外省到北京，也许还是从小城来到北京，城市对他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像邱华栋这样，实则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城市，不断追问、质疑、拥抱、逃离。王朔对城市的书写，就是对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的书写，他不记得城市，城市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空间，城市就是他的内脏，就是

他贴身的服装。而对于邱华栋来说，城市永远是一个外在场所，一个他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的一个“他者”和异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使得邱华栋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也就使他成为全力书写城市的人。而这两册“社区人系列”60篇小说，则是他不断地寻找北京人新的发展变化的图谱式的最新写作。

的确，过去的小说家，不管是王朔还是其他任何作家，没有人像邱华栋这样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城市代码，他高频率地描写城市外表，那些豪华的宾馆和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OK舞厅酒吧和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庞大的体育场、午夜的街道、囚笼一样的公寓……这使邱华栋的小说始终披着一件绚丽的外衣。这并不是简单的对城市外表进行环境描写，这些显著的城市外表本身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中心环节，构成了小说审美意趣的主导部分，就像19世纪的浪漫派文学对大自然的描写一样——没有这些关于自然景致的描写，浪漫派的作品几乎难以独树一帜。对于邱华栋来说，这些城市外表既是他那些平面人生存的外在他者，又是此在的精神栖息地。邱华栋与其他作家不同，他的城市是具体的、客观的，是实际存在的北

京。城市在邱华栋的叙事中，不再是冷漠的异在，而是我们经验可以触及的现实实在。这使邱华栋的小说叙事具有现实直接性，他所表现的生活、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在90年代之后裸露出来的新现实。年轻一代作家面对的“现实”，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预先给定本质的现实，而是我们经验直接面对的日常生活。当然，任何人的个体经验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邱华栋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商业中产知识分子，这与王朔的那些城市痞子不同，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些在新闻或文化部门，有些弃文经商，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特殊的族群——商业知识分子。这些人吃饱喝足后开始考虑生活的意义，开始寻求逃离城市束缚的价值取向。邱华栋选取这类人为表现对象当然是依据他的生活经验，同时也从中获取双重的效用。这些人可以享用现今城市所有的消费场所，而这些正是当今中国城市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这些人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文化基础可以使他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状况。邱华栋的叙事从而一举两得：既表现城市最新的面目，那令人愤恨的外表；又表现出他作为叙事人对城市生存状态深入浅出的思考。

“社区人系列”中的一些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作者的笔力具有瘦硬清峻平和的一面：没有多余的描写，没有华丽的铺排，它们只是彻底地呈现生存事实。这种叙事方式造就了非主体化的人物与物质世界的直接连接方式，极力压抑主观视点，剔除人物的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心理活动。邱华栋的这两册小说只有裸露出来的坚硬的事实，它们拒绝意义，拒绝阐释。与其说我们在关注它们，不如说那些生活中的存在物在注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种注视更让人感觉到绝对的力量呢？

## ■创作谈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基本上是写农村生活的，即便偶尔有人涉猎都市生活，也不过是写进了城的农民而已。这个发现的潜在意思是说，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城市现代化和都市精神；农业生活和小农意识仍是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随着近年网络的发达，以及女性文学和小资文学的盛行，中国的都市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作家所摹写。这些人的作品几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面貌：青春叙事、情欲主题、半自传性质。它们吸引读者的基本策略是性、反叛和另类生活，所谓“堕落并快乐着”。很显然，这一切只有在大都市里进行，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和充分的卖点。

相比于这种激越和狂野，我算最早自觉成为都市文学写作者之一。我遵循着人性追问的原则，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夸张地使用大量的都市符号（酒吧、商厦、网聊、吸毒、性开放等等），来突出人物言行的乖张和另类——这样的作品如同蝴蝶的一声尖叫，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别人，他（她）是生活在都市最前沿的。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更具有具体而实在的效果。

我的新作“社区人系列”之《来自生活的威胁》《可供消费的人生》，一共收录了我最近十年里写下的60个短篇小说。我笔下的人物不一定生活在都市时尚的前沿，他们更多的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都市中，经历着都市里的一切现实，当然，也会面临一般人所经常面临的快乐和不安、希望和绝望。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有着更为诚实的面貌。我的这个系列的小说不少都取材于新闻。我觉得，新闻

结束的地方，恰恰是文学出发的地方。因为，新闻关心的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而文学则要直指人心，描绘事件带给人内心的长久影响。比如，你可以从这部小说集中看到不少新闻的影子：清华一个研究生泼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被学生杀死、某大学女教授被劫杀、某著名女主持大闹老公男主持新闻发布会、网络第一声优案、代生婴儿事件、“借种”导致的法律问题案等等，这些新闻都涉及到了眼下中产阶层的道德的困境和问题，涉及到价值观的解体和重建。从新闻到文学，我的这个系列的不少小说，提供了一种巧妙的孕育和转化的现成本文。

我的这个“社区人系列”以60个短章，描绘了北京中产阶层的感情和精神困境，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时代性的困境。而婚姻的现实则是这本小说着力探讨的重点。我笔下的人物似乎都忘记了蒙田的著名警告：“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他们不切实际但胡思乱想。问题正是出在这里：为什么爱情一旦走向具体实在的生活，马上就会显露出它脆弱而不堪一击的面貌？难道爱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不能付诸现实？人经过了漫长的苦熬、受难之后积攒起来的宝贵瞬间，是平庸生活中残存的欢乐的痕迹，因而，也就显得格外弥足珍贵。我想通过重聚这些欢乐、希望和信心的碎片，来抵抗生存的寒冷、孤独和溃败对人物内心的侵蚀，以期把人物从沉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所以，小说中总是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我在十年的时间里，写作这个“社区人系列”，采取了相对简洁的手法，叙述艺术的纯粹和精到是我的追求，因此，具有很强的形式感。我师从于几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的技法，比如约翰·厄普代克、约翰·契佛，这两个作家的短篇小说的加法和减法做得非常好，骨架和血肉在他们的小说中比例适当。不像才华出色的雷蒙德·卡佛，减法做得过于生硬，因此显得小气和没有血肉。短篇小说的控制力是我迷醉的，不多也不少是我追求的目标。看这60篇短篇小说，我感觉有三分之一达到了我的目标。

我用了60个断片，构成了小说瓣式的结构。可能看上去过于碎片化，而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说：“碎片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谁都能听得出来，这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今天，我也在‘社区人系列’中小心翼翼地收集生活和人性中温暖的碎片，来缓解浮躁、喧嚣的生活，并为个人艰难的生存去寻找新的空间和可能性。

□邱华栋

## ■看小说

东紫《好日子就要来了》  
融入都市的漫长道路

东紫是一个对都市生活有特别敏感的作家。其新作《好日子就要来了》（《芳草》2011年6期）进一步体现了作家的这一艺术潜力。农村女孩王小丫为了在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先后买过三个假文凭，从端盘子、打小工发展到自己开店，经济上一步一步摆脱贫困，但她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她想到了通过婚姻来搭建进入都市生活的桥梁，于是走进了婚姻介绍所。都市男青年王安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自命不凡、清高独断、说话刻薄。作为大学教师的王安南一直没有得到晋升、没有分到住房，但他没有特别高的追求，只想找一个让自己幸福的老婆。在母亲的逼迫下，他也走进了婚姻介绍所。王小丫与王安南从迅速认识到恋爱、结婚。但一个偷被假文凭的案件，把王小丫的过去暴露了。王小丫多年的人生努力以及未来理想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作品把一个农村女孩的苦心经营和脱胎换骨叙述得极富质感，没有渲染农村或者底层的苦难，而是尽量展现王小丫追求城市生活并用智慧和勤奋去实现理想的一面。王小丫需要文凭不是因为她没有能力，事实证明她有极大的创造力，而是社会需要文凭，是王安南母亲这样的瞧不起农村的知识女性需要文凭。王小丫的人生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异乎寻常，但农民真正被城市接纳还有很多阻力，这种阻力既有体制的，也有文化和心理的。

马竹《戒指印》  
回归亲人和故乡

马竹近年来的创作大都与亲人有关，这大约既是年龄的因素，也与经历的人生变故有关。新作《戒指印》（《长江文艺》2011年11期）以一个警察抓赌博的故事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与案件毫无关系的故事。小说中有两个人物群体，一个是袁明清、袁明清的弟弟妹妹，妻子秦媛及其娘家人；另外一个人物群体是袁明清的哥儿兄弟；穿插在其中的是袁明清的两个情人陈敏与黎瑛。这些人物因为袁明清与哥儿兄弟打麻将被抓行动起来，因为袁明清的妻子做胆结石手术行动起来。甄亦凡、陈敏在派出所外联络人营救袁明清，见习年、黎瑛在与医院、主刀医生、麻醉师公关，确保妻女秦媛的手术，家乡两方面的亲人都闻讯赶到医院轮流守护和看望。当妻子出院时，家乡的亲人等候在村口、路边。袁明清也因此明白了许多，对妻子的愧疚、对弟弟们的亏欠、对情人的抱歉、对家乡和父母本能的依恋……袁明清瞬间感受到自己人生的重与轻。《戒指印》把家乡的灵山，把灵山上如戒指印的阳光作为力量和疗伤的归宿，是作品意味深长的构思。

(李鲁平)

马竹近年来的创作大都与亲人有关，这大约既是年龄的因素，也与经历的人生变故有关。新作《戒指印》（《长江文艺》2011年11期）以一个警察抓赌博的故事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与案件毫无关系的故事。小说中有两个人物群体，一个是袁明清、袁明清的弟弟妹妹，妻子秦媛及其娘家人；另外一个人物群体是袁明清的哥儿兄弟；穿插在其中的是袁明清的两个情人陈敏与黎瑛。这些人物因为袁明清与哥儿兄弟打麻将被抓行动起来，因为袁明清的妻子做胆结石手术行动起来。甄亦凡、陈敏在派出所外联络人营救袁明清，见习年、黎瑛在与医院、主刀医生、麻醉师公关，确保妻女秦媛的手术，家乡两方面的亲人都闻讯赶到医院轮流守护和看望。当妻子出院时，家乡的亲人等候在村口、路边。袁明清也因此明白了许多，对妻子的愧疚、对弟弟们的亏欠、对情人的抱歉、对家乡和父母本能的依恋……袁明清瞬间感受到自己人生的重与轻。《戒指印》把家乡的灵山，把灵山上如戒指印的阳光作为力量和疗伤的归宿，是作品意味深长的构思。

(李鲁平)

钟正林《晾雪眼》  
扎根在土地上的老灵魂

《晾雪眼》（《北京文学》2011年12期）是一篇有着强烈现实主义批判力量的中篇小说。新农村规划集体农庄，青年人纷纷放弃老宅基地，迁往远离土地的新街镇，惟有“我”的大娘在身患癌症的情形下，仍然以强烈的意志反抗这种迁徙。作者用大量貌似闲笔的文字展现了老大娘勤劳、慈爱与开通、明理，然而在“坐农庄”的时代大潮中，她筑起了一道心理防线，至死抵制这种生活方式。小说在最后给了我们一个惊奇、一个希望——身患癌症的大娘奇迹般地又下床了。也许是强烈的求生意志与倔强的抗争意志使她重拾那把用了几十年的月牙形镰刀。大娘不会对自己的处境作理性的分析，只能凭着经验直觉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她选择了传统的劳作方式，不愿搬迁，但大娘的抵制能延续几时？她终究还是要去的，后继再无人，她成了土地最后的守望者，在作家笔下，一个普通农妇对土地的坚守竟带上了悲壮的意味。

钟正林清醒地看到了扎根在土地上的老灵魂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惶惑和焦虑，他似乎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心态，在字里行间交织着他们同情的情感。他对土地发自内心深情，他的同情、困惑、都浇铸在他的小说人物形象上，活画出了时代进程中那些真实的乡土老灵魂。

(周逢琴)

骆英的诗集《7+2登山日记》问世，给诗坛吹来一股强劲的新风，令人耳目一新。

骆英用他的双足丈量了地球上著名的七座高峰和南北两极：乞力马扎罗峰、珠穆朗玛峰、麦金利峰、厄尔布鲁士峰、文森峰、阿空加瓜峰、查亚峰、卓奥友峰、南极点、北极点。也由此诞生了这部足以影响后人的《7+2登山日记》，可谓开创了一代新风。

中国社会经过30余年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中国经济造就了一代新人，骆英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诗人。于是，以坚强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强健的体魄为支撑，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动力，去寻找他心中清晰的目标——世界的顶峰。的确，这个时代造就了骆英，他已不再是那些历史上为了银两和高官不得不向权贵低头的柔弱诗人，抑或是被宫廷贬黜不得不浪迹天涯的游吟诗人，诗行里充溢着苦涩的哀怨和纤巧的情趣。

从骆英的诗行里我们读到一种超然于世的豪迈：“从8848米的高度/我俯视那只山峰下的雄鹰/阳光在它背上折射着/它驮着阳光划出一道刺眼的光线/山峰的后面是山峰然后是茫然/在世界的最高处反而看不见世界了”（《珠峰之二》）。这种豪气是在缺氧的珠穆朗玛峰顶生成的，它的真实就像那里稀薄的氧气令你窒息，容不得你置疑会有半点矫揉造作。“此刻我在顶峰/8000米废话”？这的确是一个前无古人高度。

在诗人的诗行里，雪山展示着她妩媚动人的一面。“听一座雪山撒娇让我怜爱/看一片山峰发怒我就肃然起敬”（《千年跋涉》）；“即便是我的影子落定时/我也不停下脚步”（《千年跋涉》）。当然，诗人的写作是面对恢弘的现实世界，但是所有的恢弘是由细微构成，写到俄罗斯登山者的死亡姿势（《死讯》），他也是一个不幸者吗？或许是；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死在了他理想的高地，应当说，这样的死，死而无憾。《风雪中的乌鸦》写出了画的质感；《山上的肢体》写的是一个人类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昆布冰川》描述人的恐惧透入骨骼。“在8000米写诗自古谁能”（《8000米废话》）？这的确是一个前无古人高度。

“在顶峰我躺在了冰雪上/想象着我

## ■第一感受

## “在8000米写诗自古谁能”

□艾克拜尔·米吉提

躺在大地的乳尖/风不知方向地四面八方吹来/风中/我高举起我的五星红旗/千辛万苦我把祖国背来/此刻我的祖国离天堂最近/看不清母亲是否向我招手/顶峰是一个回到母亲怀抱的地方/想象着天边一条炊烟袅袅升起/祖国在清晨伸展着懒腰/我的爱人推开了门窗凝望/顶峰上我的热泪开始流淌”（《关于登顶》）。这个强健的登顶者，他的命运和祖国紧密相连，他从珠峰顶上看到的，依然是母亲、国家，还有他的爱人。应当说，这是一个升华了的大爱，他躺在大地的乳尖，感受到的是离天堂最近的祖国。诗人若无胸怀大爱，他的诗行就会变得苍白。

诗人的诗体现了他高度的自信，“飞机起飞时我向警察再见/也向那张绿钞告別/我想我是乘着一纸钞票飞翔/回家/一张飞翔的美元和一个登顶的人”（《关于机场的警察》）。“今晚我要好好想想明天/明天是一个上升的挑战/怕什么/这些年我一直在上升阶段”（《文森峰一号营地》）。我们欣慰地看到，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不仅仅是诗人本人，还有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中华民族，而这一切，却以诗的形式折射在诗人的笔端。应当说，中国的诗也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上升阶段。感谢谢鲁英，用自己的双足踏出世界的经纬，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全新的厚重诗篇。

## ■短评

## 交响曲式的史诗《天螺湾》

□刘元举

间的交流被叙述得饶有兴味。作者擅长抓住文学艺术方面的因素，从房间到建筑格局到装饰布置到瓷器摆设等，都紧紧围绕着刘青燕的病情与家人的焦虑徐徐展开。刘青燕经医生检查确诊为早期抑郁症，而令人惊奇的是新婚女子，居然还是个处女。

追溯故事的来由更是扣人心弦：彭永骏回乡替胞兄去相亲，等于违心地充当了诱饵，使刘青燕误入陷阱。家族间的矛盾试图以联姻方式去化解，违背了人性，令年轻女子痛不欲生，终酿悲剧。彭永骏毕竟是走出乡村受过高等教育并在大都市见过世面有着新思想的人，他出于良心，也出于关注年轻受害女子命运剧变的复杂心情，使得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这样的情节设置，深谙长篇小说之道。

故事的编排是否引人入胜，缘自故事中人物的设置是否神秘叵测。独子彭谨祥在母亲彭氏故去后，从她的卧床中发现了一个秘柜，好比打开了一个古老家族的后窗，窥见了过去所无法想象的隐私。他发觉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然不是老族长彭荣灿的血脉，而是老长工彭石柱与彭汪氏的私生子，是现长工彭瓦土的同父异母的兄长。这种复杂的人物设置将情节编织得错综复杂起来，得以将更深刻的主题植入其中：千古礼教尽管强大，也还有比千古礼教更为强大的力量！

随着情节的发展，更让人瞠目的是那位鳏夫，彭家的清客何朝庆。他在年轻时曾经有恩于彭荣灿，遂被彭荣灿收为清客。此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几十年忠心耿耿地为彭家效力，为彭家化解了多起棘手的重大纠纷。而彭家也在无

形之中对他形成依赖。结果，到了彭家命运攸关、面临破产之际，最需要他效力的节骨眼，他却忽然留下一纸冠冕堂皇的《辞行书》，悄然离去。而主人无法想到的是更糟的结果：清查账目，惊愕地发现彭家的大量产业在长年累月中流进了他的口袋。

在情节设置上，重要的是令人信服，经得起推敲。比如，由于彭家和刘家两族间的械斗，才会有联姻的情节发生，而联姻的“特色”在于世袭族长刘家梁何以忍心将掌上明珠般的女儿刘青燕许配给彭家族长的弱智嫡长子为妻呢？这样的联姻，他岂不是吃了大亏？究其缘由，刘青燕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只是早年收养的一个孤女。既为收养的孩子，关键时刻“丢卒保车”，防止彭氏家族复仇危及自己的亲生儿子。故事开篇的“荒诞病”等一系列情节，也都顺理成章了。

这部长篇小说原名叫《联姻》，所谓联姻，皆由于乡间亟待平息械斗结束村仇的需要，而这种联姻，也集中体现了封建的中国家族特色，时代感很强。当然，对于这种联姻的叛逆则构成了人物冲突，促使新的更具悬念的故事发生。诸如刘世班，这位刘姓族长的大公子，不想成为械斗中的无谓牺牲品，也不愿受长辈庇荫当少爷吃现成饭，决意离家闯荡天下，便和女友彭永芬一同来到了大上海。因为身处下层民众之间，很快融入了社会变革的大潮流，在反军阀求生存的艰苦斗争中，他与彭永芬结为志同道合的患难夫妻，又双双对共同的理想而献身。无需人为的安排，这一对原属两个仇村的青年男女，自然而然地成了和睦联姻生死

与共的典范。

所有的故事线索，都有根有据，扎实可信，经得住推敲，因而，《天螺湾》的每一个章节，均因故事好人物真而出彩，有声有色，令人荡气回肠。

《天螺湾》在描绘悲情人生中透出诗意憧憬。大凡震撼人心的有深度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是以悲剧告终。而震撼人心的交响曲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勒第八、贝多芬第五、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无不如此。《天螺湾》也正是这样。尤其结尾处彭家的败落、刘青燕的早亡、整个优美山村的凋零，就像《红楼梦》大观园的衰败。“无可奈何花落去”，而“燕归来”的希冀呢？则是彭家后代渴望走出山村走进大上海、走向大千世界的彩虹般的向往，那正是悲情与诗性的交融。

作者在后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乡亲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出门万般难，走通虹桥见金山。’国内不少城市，都有虹桥这个地名。上海的老城原称虹桥，虹桥也就成了上海的别称之一。从乡村跨进城市的人们，无不怀着美好心愿，